

司昆侖著，何芳譯，《巴金〈家〉中的歷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會》，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288頁。

巴金的小說《家》、《春》、《秋》在多大程度上如實地反映上世紀20年代以成都為代表的內陸中國城市的風貌和民情？巴金本人的經歷和觀點在他的成都同輩知識份子中是否具有代表性，而他的經歷和政治立場又怎樣影響、甚至扭曲他對成都和五四中國的描述？民國城市史和成都地方史專家司昆侖(Kristin Stapleton)的新著《巴金〈家〉中的歷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會》(以下簡稱「司著」)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而有趣的探討。她令人信服地指出，儘管「激流三部曲」極富感染力，但其所呈現的成都社會是單薄的、有誤導性的。位於三部曲戲劇衝突核心的家庭代際衝突僅僅是成都社會眾多矛盾和困境中的一種，軍閥混戰造成的社會失序往往比巴金等激進作家竭力抨擊的父權壓迫更令成都男女恐懼和憤恨，而更多的當地才俊把發展城市經濟，而非家庭或文化革命，視為更有價值的、可行的出路。總而言之，這是一部史料扎實、構思新穎、論理深入淺出的成熟的研究著作，為歷史研究者和教育者掌握中國東部以外的民國全貌提供優秀的個案研究。

此書是司氏近著 *Fact in Fiction: 1920s China and Ba Jin's Famil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的中譯本。本書將筆觸對準「五四」前後形形色色的成都居民，從傭僕、士兵、商販、女性、幫會、洋人，到士紳、學生、軍閥和「海歸」，以不同階層的視角來窺測動盪大時代中普通民眾所面對的複雜處境和挑戰。司氏巧妙地利用巴金「激流三部曲」中虛構的人物作為楔子來開啟和組織篇章敘述。同時在對各個主要社會階層的重構中將史料中的人與小說中的角色進行對比和對證，以此探討小說描寫的合理性及五四理念與社會現實的差距。

司著中文版除緒論、結語、巴金年表外，共分七章。第一、二章緊緊圍繞着位於巴金「激流三部曲」漩渦中心的高氏家族展開。在第一章中，司氏使用成都員警檔案關於婢女買賣記錄，結合日記、回憶錄、報刊及大量二手史料，對小說《家》中的最弱勢、最引人同情的人物婢女鳴鳳進行考證，勾勒出傭僕奴婢和小妾等底層婦女的世界。司氏指出，儘管巴金本人李氏家族中對婢女的記載很少，小說家對婢女群體的直接接觸和了解也可能十分有限，但是巴金對當時婢女遭遇的描寫基本上是合理的。雖然20世紀前半葉中國呼籲廢除婢制和蓄妾的聲音不絕於耳，晚清和民國的法律也屢有明文禁止

掠賣人口和虐待傭僕，但正如司氏以及美國歷史學家 Johanna S. Ransmeier 近著 *Sold People: Traffickers and Family Life in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等表明的那樣，人口拐賣和虐待奴婢等現象在民國成都和北京根深蒂固（頁26）。員警和司法機關雖然反對綁架，但基本上容忍人市的存在和主人對未婚婢女的高度控制權，他們能給予婢女的保護極其有限。隨着戰亂、鄉村經濟的凋敝以及現代運輸業的發展，縱觀20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婢女買賣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頁34）。

若說虛構的鳴鳳有史可據，那麼作為封建父權象徵的高老太爺等人物在民初成都的上流社會是否具有代表性呢？司著第二章聚焦包括巴金的祖父和父親在內的成都士紳階層。與巴金筆下僵化、偽善、必然走向沒落的封建士紳形象不同，司氏指出，清末以降成都的士紳在地方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着甚至比以往更加重要的角色；他們也並非泥古不化，「儘管也會抵制五四議題的某些方面，但也會歡迎新思潮和新制度」。（頁36）在政治上，中央政府的衰弱、政權更替的混亂以及民國蜀地連綿不斷的內戰，令士紳階層在維護川人利益、維持城市運轉及與軍閥交涉中的作用不降反升。文化上，這些被尊稱為「五老七賢」的儒家學者和紳士是成都文化圈和教育界的核心人物。在戰亂肆虐、社會動盪的民初，他們興辦書院並贊助文化活動，以圖通過振興經學來保存文化遺產、恢復和改良社會秩序。正如作者對民初成都教育界士紳圈領軍人物徐子修的研究表明的那樣，這類儒家改良運動在時人看來並非不合時宜，徐子修在個人操守上堪稱楷模，在年輕一輩中亦擁有一些追隨者，包括後來的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和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頁49-51）。

司著的第三、四章更進一步，將讀者從城市的一隅帶入熙熙攘攘的市井，探討三部曲中語焉不詳的成都經濟生活。第三章以三部曲中軟弱但顧全大局的高家長孫覺新的視角展開敘述，研究包括覺新原型巴金大哥李堯枚在內的新興都市白領，以及商人和手藝人在民初成都的活動空間。第四章則沿社會經濟階梯繼續向下，考察五四前後成都貧民的處境。總結起來，這一時期成都的經濟生活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首先，與作為口岸城市的上海相比，四川盆地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前機器工業發展都很有有限，社會中上層的投資管道狹窄，仍集中在土地和商業領域。與此相關，當地可供受過教育的精英子弟選擇的體面職業也很有有限，正如司氏指出的，不僅知識女性感到掣肘，「對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來說，如果不想教書或者在軍閥手下辦事，職業選擇並不多」。（頁82）與舶來的物質文明有關的工作，如與郵局、百貨

商店等相關的職業最受中上人家青睞。巴金大哥李堯枚就在清末「實業救國」風潮下興建的勸業場謀有一職。再次，民國成都依然是熟人社會。無論就業或辦事，家庭關係和出身至關重要。例如巴金大哥得以進入勸業場管理層，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家族的佈局和投資，因而也有着為家族服務的義不容辭。換句話說，巴金的同輩能夠通過職業獲得個人經濟、婚姻完全獨立的可能性很小，家的影子仍無處不在。對於教育程度有限又缺乏家族人脈的男子，從事粗工是主要的出路。據時人統計，五四前後20-30%的成都男人以收入微薄的腳夫為生（頁119）。

另外，從宏觀上看，辛亥革命後成都地區持續三十餘年的軍閥混戰對地區經濟以及富人和窮人都產生重大的影響。正如作者指出的，儘管成都居民在商業傳統和對新事物的熱情上不輸東南沿海的居民，巷戰的陰影、時局的不靖和城市在軍閥間的頻繁易手讓成都居民投資興業顧慮重重，「人們不再興建那種能矗立好幾代的大屋……房子造價低廉甚至一隻貓從屋頂走過都能踩碎幾片瓦。」（頁102）能否與各種軍政府搞好關係也成了有抱負的商人和企業家們難以繞過的一關。而當富人因時局而自顧不暇時，私人慈善活動的減少和政府社會服務功能的衰弱是本就處於弱勢的社會群體處境雪上加霜。在這種背景下，家庭和親族為基礎的保障體系對於為溫飽掙扎的非技術型人口尤為重要。年輕女性至少因婚姻市場對妻妾的供不應求而有一定保障，缺乏社會關係的各年齡段的男性和老年婦女則稍有經濟或時局波動，便向下流動，極易成為失業者或乞丐，為饑寒疾病所吞沒（頁127）。

鄉村經濟的破壞和都市的貧困化為各種軍政權輸送源源不斷的士兵，四川地區的內戰頻仍和軍事化又反過來加劇經濟的破敗和社會的貧困化。緊扣着這個將四川地區與東部中國區分開來的矛盾循環，司著的最後三章深入探討成都地區軍人、幫會、青年學生及洋人等幾種主要政治力量的社會構成、政治特點和相互關係。貫穿這些章節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四川的長期內戰在某種程度上造成這些政治力量間獨特的共生關係，他們的主張和影響非常複雜，很難用意識形態上保守或進步的簡單二分法來理解。

以民國成都的性別秩序和女權運動為例，司氏敏銳地指出盤踞川渝一方的袍哥組織和袍哥文化對當地的兩性政治影響不容小覷，他們往往成為成都所謂新女性最忌憚的保守勢力。隨着官方體制在治安、糾紛調解和其他地方管理領域影響力的衰退，原本主流外、半地下的袍哥組織以其緊密的內部聯繫以及對本地社會網路的熟悉和滲透，成為包括軍閥在內各方勢力倚重的地方實權操控者，「到1920年代，成都的每個區域都開設袍哥山堂。這些山堂

的堂主都是著名的商人，監管新人入堂，收取保護費……一些員警機構和軍政府當局甚至開設了自己的山堂」。(頁150-151)

袍哥文化崇尚俠義、忠孝、忠貞等價值，有濃厚父權意識，與青年學生抨擊儒家秩序、崇尚兩性平等的五四價值觀格格不入。再者，袍哥的道德理念儘管與保守派士紳有共鳴，但潔身自好的士紳家庭又通常不屑與經營賭博、鴉片等活動的幫會成員高調為伍。最後，土客之別的地方意識、軍閥的獨斷以及頻繁的戰禍造成的慘狀又令袍哥和革命學生在內的很多本地人視軍閥為無視風俗、破壞規矩的外來人(見第五、六章)。司氏注意到，這些微妙的分歧、不滿、妥協和聯繫往往會以兩性政治的形式表達出來。比如，袍哥對膽敢蓄短髮、拋頭露面的新式女學生在成都街頭的騷擾和懲罰，就不僅僅有反女權、反新文化的意味，更有捍衛本地傳統與道德、抗議外來軍閥，以及塑造自身本土英雄形象的意味(頁182-186)。

縱觀全書，司著的優點很明顯。作者示範如何把虛構文學通過小說和小說以外的史料落到「實」處。通過家喻戶曉的作家和小說人物，作者向讀者引介模糊在小說邊緣和縫隙裡的蕪蕪眾生，拓展和豐富「激流三部曲」固有的社會空間。又通過對小說家巴金經歷和創作動機的討論進行對主流五四話語的反思，巧妙地將近20年來史學史上對五四運動、軍閥和政黨政治、性別研究、城市史及中西交流史的諸多論爭編織在對虛實之間民國成都社會的討論中，同時對以上所有議題，提出基於四川歷史經驗的更新、修正及具有開創性的獨到觀點。司著在拓展廣度的同時，對微觀歷史情境的處理亦十分細膩，在描寫失語的底層社會成員時致力於共情而非救濟式的同情。例如在重建婢女視角時，作者通過史料挖掘和對民國成都城市面貌的熟稔，令人信服地復原出鄉下女孩在仲介的監控下從城南的人口市場步行到城東北主顧家一路可能的所見所感(頁20-22)。司著的深入淺出和敘述上點面線的兼顧，讓這部社會史論著不僅適合近代中國史專家閱讀，也適合歷史教學者、研究生、本科生、文學研究者和熱愛成都的一般大眾。

司著廣泛的目標讀者和作為譯著的特性，卻也是其主要缺點。作為一部以英語世界專家和業餘讀者為目標的中國史著作，作者勢必要在平衡敘述的深度和細度以及推進前沿史論方面作艱難的選擇。在這方面司著進行很多優秀的探索，但眾口難調亦在所難免。如果在中譯本成書過程中可以對原有內容進行適當增刪，中文讀者的閱讀體驗可能會更優。另外，中文版翻譯和出版過程中的一些技術性瑕疵也使本書留有遺憾。對於某些重要的中文引文，譯者似乎沒回溯原文，而是將司氏對中文史料的英文翻譯回譯成中文，

難免有夾生之感（例如第50頁引文）。中文版中提及的作者譯名也有前後不一的問題，比如 Madeleine Zelin 在第100頁被譯為「曾小萍」，在第101頁則以「澤琳」出現。最為遺憾的是譯本對原著注釋部份的縮節及對參考書目和詞條索引部份的刪除。注釋部份提及的著作和史料只有注明主標題，沒有副標及出版資訊。在沒有參考書目的情況下，感興趣的或有疑問的讀者只能通過英文原著來查找作者引用的史料和史著，非常不便。

馬翎

紐約州立大學傑納蘇分校歷史系

井上徹，《華と夷の間：明代儒教化と宗族》，東京：研文出版，2019年，483頁。

井上徹長年深耕於宗族研究，致力於探索士大夫在地域社會的作用和影響。2019年，作者集結近十餘年發表的相關論文，出版《華と夷の間：明代儒教化と宗族》，將關注的區域轉移至處於王朝版圖邊緣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借鑒遠藤隆俊、常建華的宗族研究及科大衛、劉志偉、片山剛等中日學者對廣東的研究成果，探討在16世紀商業化和都市化浪潮中，該地區宗族的形成及普及，從不同角度分析多文化、多民族的廣東社會中宗族的實態。（頁7-12）

本書題為「華夷之間——明代儒教化與宗族」，所謂「華夷」區分是文化上的，「儒教化」或稱「漢化」，是指16世紀以降，多民族雜處的廣東社會被包容進以科舉官僚制為軸、漢族的單一的儒教文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擁有身份和特權的鄉紳發揮影響力，承擔統合地域文化的職能。（頁91-92）本書正文共分為三部份，所討論的時間段重點在明代嘉靖至崇禎時期。茲加以簡要介紹。

第一部份名為「華夷之間」，共有四章，主要分析廣東非漢族地區「儒教化」的過程。16世紀，兩廣地區海外貿易興盛，同時非漢族地區叛亂頻發，面臨嚴重的軍費負擔，兩廣在財政上自成一體，廣東支撐着廣西的地方開支。在地方士大夫的輿論推動下，明朝政府改變對外政策，重開民間貿易，恢復抽分制，以關稅收入作為平亂軍餉。作者主要關注西江流域瑤人聚居的羅旁地區，地方官的收奪和漢人的開墾使得瑤人舊有的生計方式被破